

学术圈里的“蛋先生”

□ 李佳彦

「苦尽柑来」也藏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飞往日本留学的飞机上，女儿梁金明打开母亲吴爱纯包好的现金，泪水打湿衣领。布包的碎花底色，是母亲最钟爱的图案，褶皱里还残留着海风的气息。梁金明带着母亲曾经想到首尔读大学的愿望离开济州岛，又在举家支持下奔赴海外留学。一个沉重又炽热的梦想包裹着她。

这是最近引发热议的韩国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中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该剧以济州岛女性吴爱纯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韩国济州岛三代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她们在爱情、亲情的种种体验中经历四季，迎来春天。

外婆金光光潜入深海捞回鲍鱼，母亲吴爱纯风雨无阻码头摆摊，女儿梁金明才能自豪地把首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亮在手中。网友把这一段情节总结为“外婆在海里游，母亲在地上跑，女儿才能在天上飞”。对于最年轻的女儿来说，是前两代女性的托举，才能让她展翅。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年轻人都说，看梁金明就像看到了自己。我在梁金明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的外婆在岭南田地弯腰耕作，母亲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咬牙在省城站脚脚跟，我作为千禧年后的女儿终于有了自主选择爱好和未来的底气，在母亲的目送下去往千里之外的城市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像这样的叙事，发生在许许多多的新世纪中国家庭里。

济州岛贫瘠的土地带不来丰厚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都仰仗海洋，但吴爱纯仍然给了女儿梁金明无限广袤的蓬勃爱意。吴爱纯从小希望女儿成为“能掀桌的人”，拒绝让女儿成为生活艰辛的海女，省吃俭用也要给女儿买好几辆自行车，为支持女儿去日本留学卖掉了济州岛老家的房子。梁金明在这样的滋养下，变得勇敢而坚强，敢于在面对初恋家庭的羞辱时说出“我爱你，但我也爱自己”，有野心说出自己也想做总裁。

在吴爱纯的人生里，她把自己未竟的梦想托付给女儿，希望她成为“一飞冲天的龙”。但对于梁金明来说，这意味着背负所有希望，承受托举背后母亲说不出的艰辛。她的自由是愧疚的，也是拧巴的，她不自觉地用攻击和责备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

面对外人，梁金明把讲话当成“写情书”，逐字推敲，但面对母亲打来的一通通关心电话时，她常常不在乎自己说出口的措辞，“像在废纸上涂鸭”。“我气我妈那么穷”，梁金明抱怨母亲贫穷的言外之意是心疼，“我气都是因为我，她才会那么穷”。她也在被称为“长女”“支柱”的话语里撒下了父母不曾察觉的压力。

饰演梁金明的演员李知恩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这样理解角色：“（梁金明）作为长女，那个因为层层积累的负担而过早懂事的孩子，虽然最终出现了心灵堤坝倒塌的瞬间，但她之所以想更好地生活，也是因为家人。”梁金明也像大多数的年轻人，并非“理想孩子”，身上存在许多的矛盾，自卑但要强，对母亲不够柔软但仍存念感恩。

在一次争吵中，梁金明脱口而出不想复生母亲的父亲，“嫁到一个穷人家，勉强维持生计过一辈子”，说完她便悔恨地低下头，知道自己伤了母亲的心。

吴爱纯愣了愣，承认女儿说得对。但她顿了一下，又笑着说，她的生活里也有过阳光般的完美时刻，“我只是希望你承认我的人生也有价值”。

作家、哲学家波伏瓦在《她弥留之际》一书中写到了她与母亲的对话，“‘父母并不理解他们的孩子，但这是相互的’，我们谈了那些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不过也只是泛泛而谈”。母女之间似乎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酸涩而痛楚的关系。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曾分析，原生家庭在社会学的视角中存在滞后性，父母所接触的话语体系来源于其年轻时所认可的社会规范，当社会变化迅速时，父母的社会规范对孩子来说自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超越自己的时代来爱另一个人”。在我们希望母亲变得更理想的同时，也应该拓宽理解的边界，接纳她身上不完美的部分，更敏锐地体察她表达爱的那些行动，那些在我们实现理想关头的经济支持、久未归家时她捧出的那碗热气腾腾的汤、异地生病时她第一时间打来的电话。

跳出“理想母亲”和“理想孩子”的框架，承认我们和母亲作为个体的复杂性和局限性，方能再度看见彼此之间羁绊深厚、延绵日常的爱。

在梁金明看来，母亲曾拥有自己的追求，这一生并没有做完想做之事，她好奇母亲的人生有没有遗憾。吴爱纯停下了筷子，在饭桌上坦然地说，“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想做，我用自己方式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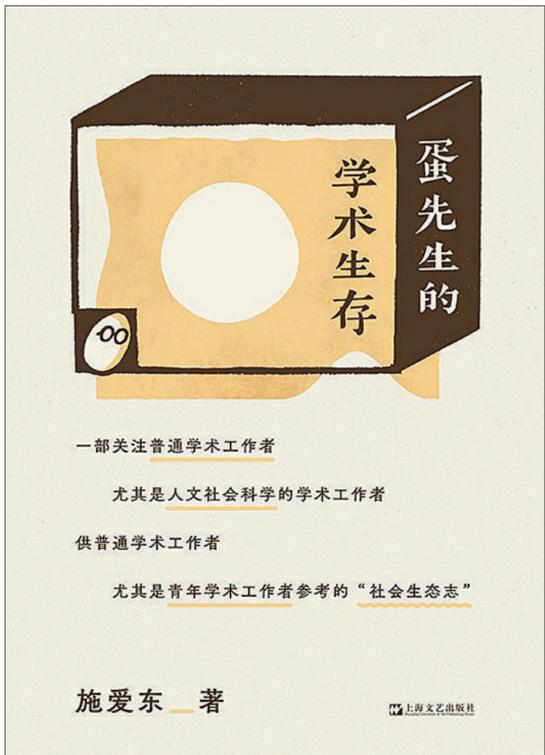


《苦尽柑来遇见你》剧照 网络截图



▲施爱东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封面



一部关注普通学术工作者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者
供普通学术工作者
尤其是青年学术工作者参考的“社会生态志”

施爱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会想到家庭，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县城到城市，评上了研究员，成为一名学者。他觉得自己顶多算得上是在两蛋相碰的游戏中间，壳相对厚实的那个蛋，一个比别人稍微勇敢点、不怕同行打击报复的“蛋先生”。

从2002年起，施爱东就在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服务，他常常在会上拍桌子、提反对意见，但也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201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副会长改选，施爱东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全票，曾经被他批评过的同行，全都投了赞成票。

“虽然他直来直去，但并非出于私心”，漆凌云提到，更多的时候，他从施爱东身上感受到的反而是“贴心”。

漆凌云博士毕业、刚到湘潭大学任职时，既要上课，还要处理其他杂事，做学术的时间变少了，学术成果不如从前。他有些不自信，很少报名参加学术会议。让他没想到的是，施爱东主动发邮件鼓励他多写文章、经常出来开会，开阔学术视野。在学术会议上见上了面，施爱东会说，“哎呀，太好了，你这个终于来了”。漆凌云至今仍然很感动。

2019年，《民族艺术》杂志找到施爱东，希望他帮忙主持编辑部新策划的“新时代故事学研究”专栏，负责部分组稿和审稿工作。施爱东没有犹豫，答应下来。

栏目里的文章，几乎每篇施爱东都仔细看过，最多的时候，他帮着改了8遍，以至于有年轻人主动在论文中挂上他的名字。他拒绝了。

“我的目的是推他们一把，如果都挂了我的名字，那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专栏开设以来，已经发了几十篇年轻学者的论文。

看见年轻人，施爱东总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他见过不少年轻人，对做学术满怀憧憬，对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几乎毫无准备。看着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施爱东不忍心。他年轻时也把学术研究看得非常神圣，后来更成熟职业化地对待学术。

他选择在《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中写出真实的学术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世故的那部分，也成为学者的必经之路。

“你也得经历这些东西，才能对社会、人性有充分的了解。对一个学生或者青年学者来说，是不是有这么多世俗因素，你就得放弃学术？恰恰不是，有些东西是你无法自主、无须考虑的，你要相信，认认真真做学术，自然会得到机会。”

他也常去外地高校给学生作讲座。他发现，有

些学界已经讨论得非常充分、非常成熟的理论，很多学生不了解，有的老师教给学生的知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学生上来就问“民俗学的本质是什么”，不知道怎么找研究选题。

施爱东自己在学术上也走过弯路，花了很长时间才会做学术的方法，他心想，为什么我不直接把这些方法写出来？在《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后半部分，施爱东在讨论如何做好学术研究。

在肖海鸥眼里，施爱东是一位有趣的学者。他研究民间故事，也关注短视频的“套路”：为什么民间故事总是大团圆结局？为什么短视频中的主人公总叫小帅和小美，黑社会叫夜彪，小喽啰是卡拉米？为什么所有理发师都叫托尼？隔壁的人永远姓王？

他发现，短视频故事和传统民间故事一样，为了满足老百姓对圆满的向往，核心情节都是主人公接下一项挑战或任务，通过艰苦奋斗战胜了对手、完成任务并获得奖赏。而小帅、小美和传统故事中的张三、李四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便于理解记忆，把人物面具化。

施爱东也关注脱口秀，去年同期对打的两档脱口秀类综艺他都看了。他总结脱口秀的“套路”：多数情况下，脱口秀所讲的故事是演员“卖惨”以及变相“卖惨”，讲自己的不堪往事、尴尬瞬间，以及吐槽父母、上司、同事，再上一段“价值”。

最近，施爱东还建议自己的学生也研究脱口秀。在他看来，这些新兴的文艺样态在学术界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传统的当代文学研究关注小说、散文、诗歌、戏曲，但现在短视频的观看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同类文字表达的阅读量。”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出版后，火热程度完全超出了肖海鸥的预料，卖了两万册、豆瓣评分8.4，还登上2024豆瓣年度社会纪实图书榜。肖海鸥注意到，不少年轻人会在活动现场寻求施爱东的帮助，而他“从不会给不切实际的建议”。

他还记得，一次活动现场，一个女孩问施爱东，自己表妹的师兄暗示她，可以帮她发论文，但有一些条件，该怎么办？

“不要相信他，他提供不了真正的帮助”，在施爱东看来，做学术不能采用这样的交换方式。

他还建议家境不好的年轻人适当放弃学术理想，不一定非要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因为北京的房价和普通学者的收入差距太大，在生活和学术之间，“生活更重要”。

这条建议让他挨了许多骂。

有人骂他胡说，有人觉得他这是出身歧视，还有人质疑他本人的家庭条件。但也有人认为，这是

影音书画

一边搞发明，一边断舍离

实物展出。该手术一度被视为治愈精神疾病的希望，参与研究和尝试的医生还因此获得过诺贝尔奖。

这类手术早就被叫停了，破坏太多脑组织，会损伤病人的智力、情感及语言功能——已经是今人的常识。

《旧物录》记载了与之相似的故事。这本书讲述了最近300年，人类世界里85个“消亡之物”。人类过去两三百年来发明的新东西，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小到拍手就能打开或关闭家用电器的开关，大到能将人在3小时内从伦敦送到纽约的超音速协和式飞机，新的物品不断被发明、生产、停用，成为旧物。协和式飞机在飞行24年后，以一次109人罹难的坠毁事故震惊世界，后来，人人都能坐上的平价客机成为主流，不再有公司生产协和式飞机。

但这不影响协和式飞机在发明之初，带给人们的意义：为更快抵达远方探路。

书里提到的旧物里，最让我感动的是因瓦卡汽车，那是20世纪英国政府向残疾人免费提供的汽车，可以根据驾驶员个人需求改装操作设备，被视为福利国家的象征。

不过，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衰退，因瓦卡汽车动力不足、性能不稳定，有人戏称它为“移动路障”。渐渐地，因瓦卡汽车停产了。但我认为，这种汽车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文明社会试着满

足残疾人平等出行的权利，让他们也能驾驶车辆，开往想去的地方。

我想，无论这些发明多么稀奇古怪，发明者的初衷都是为解决日常生活困境或实现人类梦想提供的思路和尝试。

人类希望更快速去远方，于是有了飞机、高铁。人类希望信息更高效，所以有了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我们对当下不满意，渴望“明天比今天更好”，所以愿意创造。

世界对待发明的态度，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75.6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突破400万件的国家。其中，势必会有很多尖端技术解决现实问题，也有很多专利不一定能在当下发挥作用，但能给予未来启示。

从各个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可以窥探行业的技术发展情况。根据欧洲专利局（EPO）发布的2024年专利指数，计算机技术（包括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数量上最多，全年申请了16815件专利。清洁能源技术相关领域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最快。相对来说，数字通信领域的申请量在减少。

在变革浪潮澎湃的当下，我们还应该保持谨慎，即便是主流和常规的研究、共识，也可能成为将来的脑白质切除术。

先进和过时，它们虽为反义词，却总是毫不互

斥地出现。每当有过时的、被淘汰的旧物，就证明，新物诞生了，技术正在进步。

18世纪，许多西方国家的男女会在腰间佩戴腰链，把怀表、钥匙、小装饰品挂在上面，腰链是当时时髦的象征。后来，放置物品的功能被衣物口袋和箱包取代，慢慢地，腰链成了当代钥匙圈的前身。

在认识旧物时，我们也在刨根自己。我曾采访一位研究博物学的学者，他说，博物馆人应该收集最近几十年、伴随中国迅速发展而消失的物品，比如黑白电视机、收音机。他看到了旧物的大量消逝，时代奔流向前，产品更新迭代，每个人不断地买买买，也亲历着断舍离。

作为90后，我的青春与小灵通、VCD、MP3相伴，如果要打造我个人的博物馆，最能代表我少年时代的物品，是我7位数的小灵通号码，那是属于我的“时代的眼泪”。如今，街上很难看到销售CD、租赁影片光碟的店铺了。

如今，我们有智能手机、蓝牙耳机、音乐和视频播放移动端应用。云端装下了无数歌曲、电影，再也不需要在家里腾地堆放碟片。说起来，千禧年过去了25年，我有点怀念它，但我不会回去。

《旧物录》
【英】芭芭拉·彭纳等著 丁宇岚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5年2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晓颖
记者 从玉华

最近，学术圈里突然多了个“蛋先生”。“蛋先生”还写了一本书，教人怎么在学术圈生存。

他在书的开头就写论资排辈、老教授互推等学术圈里的现象，甚至点名批评一些学者。不少读者感叹他下笔犀利、嘴巴真毒，觉得他把供职过的机构得罪了个遍，连责任编辑肖海鸥拿到书稿，都怕被打举报电话。

但“蛋先生”施爱东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他在微博上为《蛋先生的学术生存》转发的广告语是，“赶紧买，搞不好施爱东哪天吃官司，此书被迫下架，就读不成了”。

施爱东57岁了，在中山大学当过10年教师，后来从广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民间故事。现在他是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还担任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他对学术圈的规则很熟悉。

“第一学历歧视”“35岁危机”，施爱东通通公开表示厌恶，他把这些视为内卷的罪魁祸首，认为这逼着人从初高中就开始竞争，还必须在念完书后，立马就找教职，导致很多做学术的年轻人都不懂社会。

他说，研究民俗学却没有社会经验，还要理解老百姓、理解民俗，“这不是搞笑吗？”

他还说有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有的地方变了味，比如“破五唯”（五唯指在教育科研评价中过分依赖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等单一指标的评价体系——记者注）。

“具体落实到高校，反而把‘五唯’突出了，本来有的学校只有‘三唯’‘四唯’，现在好了，大家都知道有‘五唯’了，反而增加了维度和标准。”

湘潭大学教授漆凌云和施爱东认识20多年了，两人曾同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他对施爱东的率直印象深刻。

漆凌云还记得，多年前有人谈起一位学者出了几十本书，在场其他人听到，都觉得不得了，唯有施爱东持不同意见。他说，这位学者书虽出得多，但都是介绍性的著作，如果没有学术质量，再多也就那样。

即使是当面，施爱东有时也不留情面。一次学术会议上，规定每位嘉宾演讲10分钟，有位学术界的前辈，到了10分钟还没讲完。漆凌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而言，考虑到对方的年纪、学术地位，主持人很少打断，有的老学者常常讲20分钟不停，到最后只能压缩年轻学者的时间。但在那场会议上，施爱东直接打断对方说，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的话对事不对人”，漆凌云说。

在会议上，施爱东发言时总是直接说意见，要是投递论文遇上他做审稿人，几乎找不到夸奖。

施爱东记得，曾有位老师得意地和他分享“说话的艺术”，说自己在点评文章时八分夸奖，暗含两分批评，觉得已经批评得很严厉。但是施爱东说：“我只听出了夸奖。”

“学术是在批评中进步，如果每个人都互相照顾面子、情情，那世上的真话就都会被客套话遮掩。”施爱东认为，说好话很容易，但要批评，反而需要仔细阅读对方的文章，理解对方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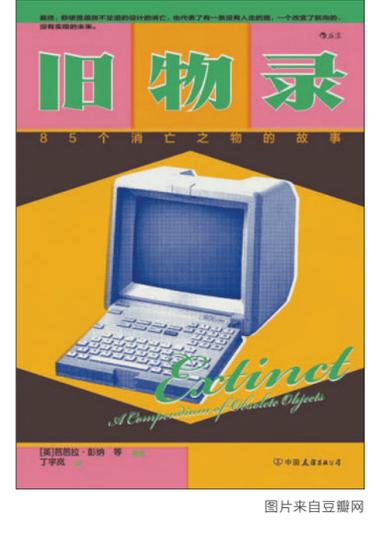
施爱东拒绝过一位期刊主编的约稿，还把对方数落了一顿，因为对方出了新规定，不发博士生的论文。故事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相对小众，发表文章并不容易，不少刊物出于引用率、杂志评级的考虑，不愿意发博士生论文，更倾向于发有职称、有学术声誉的教授或副教授的文章。

“不发博士生的论文，学生没办法毕业，找不到工作，就等于断了青年学者的后路，也是断了民俗学的后路，这样的刊物，我绝不会支持。”后来对方给他赔礼道歉，说会重新考虑，施爱东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施爱东知道自己会得罪一些人，但他说，自己只是说了真话而已。他也希望有人批评他。

他把自己的论文发到教学群里让学生批改，学生以找他文章的茬为乐。《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出版后，研究所里的同事跑来告诉他，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让他不要生气。施爱东告诉对方：“我怎么可能生气呢？我批评别人，却不允许别人批评我，这不正是我反对的吗？”

不过，施爱东坦言，在开口批评人之前，他也



图片来自豆瓣网

□ 魏晔

很难想象，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治疗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最后的手段，居然是在头骨上钻个孔，插入一把外形像螺丝的手术器械，旋转，再拉动手柄，用钢丝切断神经纤维。

这种手术器械叫脑白质切除器，如今被收藏在曼彻斯特大学医学与健康博物馆里，作为旧日医疗